

归档时的案卷号：

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

卷内共

份

张

保管期限

卷 内 目 录

--	--	--	--	--	--	--

--	--	--	--	--	--	--

中共青島黨分局

東北工作委員會直屬軍訓支部

概況

--	--	--	--	--	--	--

--	--	--	--	--	--	--

--	--	--	--	--	--	--

--	--	--	--	--	--	--

中共晋察冀分局

东北工作委员会直属革命支部概况

目 录

中共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直属革
新支部概况（于宝琪审定稿） …… 1-28

中共晋察冀分局东北工委委员会直属革
新支部概况（“党史资料通讯”第四期12
—21页） …… 29-38

扎根冀中，开辟党的工作
——访于宝琪同志记录整理稿 …… 39-60

于宝琪同志访问录 60-69

于宝琪同志简历 70-74

孙玉岐、趙精危、杜懷武三同志

访问录稿引 75-81

证实材料 82-89

杨起时(石青山)同志访问录 90-100

吕健东同志回忆录 101-109

访 间 登 记 表

姓 名	于 宝 瑞	曾用名	于 安
性 别	男	年 龄	79
政 治 面 貌	中共党员		
工 作 部 门	车 漯 矿 务 局		职 务 副局长(高 佈)
访问记录是否经本人审阅		于 宝 瑞	
访 问 日 期	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		访 问 人 何 元 进、赵 春 英
被 访 人 简 历	<p>一九四三年三月—一九四五八年八月 在阜新新邱(开)开辟党的工作。</p> <p>一九四五年八月—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 在阜新地区任区长、武工队队长，接收阜新矿务局，任总经济矿务局总经济科科长。</p>		

访 间 及 征 集 内 容 摘 要

晋察冀东北分局工作组派于宝瑞时到
东北阜新开辟党的工作情况。审查《晋察冀分局东
北工作组直属阜新支部概况》修正稿。

备
注

中共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

委员会直属年轻支部概况

一

一九四〇年，中共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东复）开始往东北派干部，目的是和东北抗日联军取得联系，开辟东北抗日根据地。因为当时抗日联军多在山区和偏僻地带活动，很难接触上；派去的人情况不熟、口音不同、没办法洗脚为原因，通常常遭到敌人杀害。

一九四三年三月，东曼又派于宝琪（于澍）
往东北开辟党的工作。故去地界有三处：吉林、
梅河口和齐齐哈尔。计划先到齐市，站住脚
再去吉林、梅河口。经东曼指示他：在东北
站住脚之后，就要“长期埋伏，积蓄力量，找
待时机，配合反攻。”①②

于宝琪从一九四一年就开始接触到了一些
东北的情况——奉天（沈阳）、梅河口、海拉
尔等地都有他的老乡。他的大多是“九一八”事
变后到东北谋生的，有的和他常有书信来往。

一九四二年五月，他去信把在奉天（沈阳）自来水公司当工人的同乡孙玉鸣叫回家乡，并一同向东委江报了一些情况。党组织认为于宝琪熟悉情况，有办法潜脚，派他去东北开辟党的工作比较合适。于是，东委负责同志寒光（韩光）、石青山（杨超时）给他办“天津劳工协会”挂上号，买了“回国证”，让他带着家眷去东北“谋生”。

当时，日本侵略者在战场上节节失利，对出入山海关的人员控制甚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

于宝琪带着爱人于桂婷和同乡孙玉凤，化装成讨饭的样子，蒙混过敌人，经过山海关到了东北。

华利村印露天场有个把头叫修志忠，是于宝琪的老乡，一九三三年他们俩曾一起海铁路当过工人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修志忠混上了个把头。于宝琪投奔他，到了印露天场。修把头见他携家带着像个讨饭的样子，念及往日的亲情，就把他安置在了他的柜上，于宝琪当了铁道木匠，孙玉凤当了推车工。于宝琪在铁

路上干过，铺铁道，打道钉比一般人整练，干起活来又快又好，俺把头放心，工人佩服，就连盖工的日本鬼子也向他竖过大拇指。就这样，于宝琪不仅在冀鲁露天煤矿出了脚，而且还有了一些威信。

在修把头柜上，河北省易县的老乡不少，于宝琪是带着家眷到煤矿来谋生的，老乡们对他都分外近乎，有的还常向他打听关里的事情，于宝琪就不失时机地接过他们，“逐步地、不露骨地”和他们沟通感情，进行宣传渗透。②

特别是针对一些人由于轻信了敌人在“关里”取得的“大胜”的虚假宣传，而愁眉苦脸、精神不振的情况；对八路军不了解，没有正确认识的问题，讲有关国际形势，讲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，进而宣传共产党主张和抗日救国的道理。渐渐地，大家觉得听了于宝琪的话，长志气，恨敌人，很开心，好象是从他那里看到了光明、看到了希望——他象一块砾石，吸引着，大家都愿意向他靠近。

在临来东北的时候，东曼负责人寒光（韩

毛) 曾指教于宗祺和孙玉成：“你们是两个党员，也是个支部；年初三个党员才设党的支部。你们结社之后，就发展嘛！”在周围有了群众之后，于宗祺就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。把年青的、政治可靠、有胆有识的工人发展入党。到一九四四年春，先后发展了陈玉林、张连(瑞玉山)、杜焕武、姚培庭、于德水等五名党员。^③为了保证安全，更好地执行“精干隐蔽”政策，发展党员之后在形式上没有成立党支部，党员之间也不发生过横向联系^①；但他

们有统一的指挥领导，有正确的分工：有的侧重在工人中开展工作；有的设法接近上层人物和苦多苦的小职员；有的侧重在砂礫队中开展工作。东吴直属华纵支部就这样隐蔽在城隍庙地开展了党的工作。

一九四四年八月，于宗琪借修挖头的名义开了个前铺，前铺主要是于桂婷、陈玉林和于德水三个支撑门面（陈玉林负责接洽联络，于德水推前铺，于桂婷搜集）。于宗琪仍担当铁道木匠，孙玉鸣坚持每天露天坡推车翻矸

石。煎饼铺确实起了很坏的作用：掩护了党负责头联络工作；在群众买煎饼的时候向群众揭露敌人的真相；联系了一些开票先生，方便了工作。

于宝琪他们注意了御敌人的情况。周围有什么问题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都要打听一下，弄清究竟。当时新邵火车站附近“象社会”十分盛行。参加“象社会”的多半是耽迷色日本鬼子的上层人物，一般情况他们都知道，还有一些特务也参加活动。“象社会”的情况比较

多，消息也灵通，也比较真实。于宝琪就派陈玉林打入进去。“家社会”老是有活动，什么孩子生日，父母周年，都要“摆鱼掌”。去了就得磕头，最少也得拿一块钱。于宝琪他们当时挣不了几个钱，参加几次“摆鱼掌”，经济上就成了问题。但是，为了摸透敌人情况，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，让陈玉林及时参加。有一次，陈玉林听那些上层人物议论炮，太平洋战争打得艰苦，日本鬼子伤亡惨重，没吃的，东战场上饿死。于宝琪他们就把得的消息在前

饼铺，在露天施工地，在工人大店子里向群众进行秘密传播，以此揭露敌人在战场上失败了的真相，以坚定群众反满抗日的信心；他们又从“家社会”得知：日本鬼子的兵将缺乏，三年一更换刀剑，铁甲要改成两年一更换。许多日本鬼子对此很不满，有抵触情绪。不多时，他们发现左藤忠厚不属，知道他是不愿意再去服务的，又不敢反抗上他的命令，吕时偏偏地发，于宝琪他们认为这是做日本鬼子工作的好机会，就主动砌的砖柴，往左藤家里送去，以